

 思想中的世界

英美哲学家 圆桌

Welten im Kopf-England/USA

英格博格·布罗伊尔 Ingeborg Breuer | 著

彼德·洛伊施 Peter Leusch

迪特尔·默施 Dieter Mersch

李国山 | 译

华夏出版社

英美哲学家圆桌

[德]布劳耶尔·洛伊施 默施 著

李国山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美哲学家圆桌/(德)布劳耶尔等著;李国山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ISBN 7-5080-3037-0

I. 英… II. ①布… ②李… III. 哲学家-概况-西方国家
-现代 IV. B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472 号

Ingeborg Breuer, Peter Leusch, Dieter Mersch

Welten im kopf.

Profile der Gegenwartsphilosophie

© Rotbuch Verlag, Hamburg, 1996

策 划: 沈 默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装帧设计: 闫志杰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 2003年5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1/24 开

字 数: 138 千字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英美哲学家圆桌》探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思想。我们这里介绍的是影响并决定性地塑造了当今哲学讨论的那些作者。卡尔·波普尔和保罗·费耶阿本德都出生于维也纳,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英美生活和授课。此外,就他们的思想而言,他们也是属于分析哲学论辩圈内的——只是费耶阿本德是带有批判性和摧毁性的。分析哲学尽管肇始于德语地区,却是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区发扬光大的。斯蒂芬·霍金是物理学家,却以其宇宙学涉足了一个既推进了数学-自然科学,又推进了哲学的科学思辨领域。

这些哲学剖析中许多都是以我们为科隆的德国电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为蓝本的。为此,我们要向希尔德加德·克莱致以特别的谢意,她对我们的专题节目很感兴趣,并为完成本书提供了资助。

1995 年 10 月于科隆和柏林

目 录

前 言	1
-----------	---

导论:变动中的思想	1
-----------------	---

在解释的迷宫中

戴维森纲领	18
-------------	----

“怎么都行”

P. 费耶阿本德的实用主义 - 无政府主义的科学及 文化批判	32
---	----

上帝丢落了的骰子

S. 霍金的宇宙论	47
-----------------	----

理论使人不朽

K. 波普尔爵士的证伪哲学	60
---------------------	----

实在论能有多实在?

H. 普特南:在形而上学与怀疑论之间走钢丝 73

知识及世界的模糊边界

W.v.O. 奎因的经验论相对主义 85

自由主义与正义

J. 罗尔斯对政治哲学的重建 100

无根基的民主

R. 罗蒂的自由反讽理论 109

“人是宽容而又有创造力的动物”

与 R. 罗蒂的对话 122

我所意想不到的,我便可以表达出来

J.R. 塞尔的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 130

句法学不是语义学

与 J.R. 塞尔的对话 144

残缺性的建筑

R. 塞内特的后现代伦理学纲要	148
-----------------------	-----

我们的躯体失却了安身之地

与 R. 塞内特的对话	161
-------------------	-----

复归本源

C. 泰勒反对现代记忆丧失症的工作	170
-------------------------	-----

游离理性的谬误

与 C. 泰勒的对话	184
------------------	-----

差异与协同性

M. 华尔策对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修正	192
--------------------------	-----

参考文献	203
------------	-----

译后记	209
-----------	-----

导论：变动中的思想

一本历史词典曾以不那么客气的口吻将“美国特色”表述为：“肤浅、快节奏、过于看重物质财富、无休止地追功逐名、哗众取宠、工作与生活机械化、肆无忌惮地盘剥自然与人力。”^[1]

在欧洲，关于美国的图像一直是分裂的。在肯定以及——不管是自愿地还是不自愿地——适应美国俗文化与粗暴拒绝这一大陆的所有精神成就这二者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所以，就像贝尔特·布莱希特已将美国斥责为标榜“民主”却完全不懂得民主一词真义的国度一样，许多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仍然坚持认为，可口可乐的故乡最多只能生产出文化。某种程度上可与快餐相匹配的便是这样一种“快想”了：不喜好悲剧与深度、不追求体系与思辨，倒是浸透着只把美元认作惟一终极目标的实用主义。因此，精英欧洲关于美国缺少文化的贬抑之辞可谓多矣！在美国，对真理的喜爱被以实用主义为其哲学表现的商业精神遮蔽了——这是贝特兰·罗素的断语，尽管他的思想与美国思想之间有着不容忽略的共同点。而在 C. G. 荣格眼中，美国人简直就是带着“黑人举止”及“印第安人灵魂”的欧洲人，是开化的，但绝不是有教养的野蛮人。

可是,近年来关于美国的商贩精神,关于肤浅与消费文化的谈论冷清了下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哲学出现了繁荣。自从主要源自法国的后现代理论出现衰迹以来,人们便把目光转向了大西洋彼岸。后现代思想家的解构技巧被一种现实的、不那么艺术化的注视所取代,这种注视——尤其是在美国社群主义者或者在理查德·罗蒂的“自由的反讽”那里——使思想重新获得了某种社会根基。与此同时,欧陆哲学却也在美国派上了用场。弗里德里希·尼采、马丁·海德格尔、约尔根·哈贝马斯、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在当今美国哲学中受到了娇宠。1955年,美国哲学家拉尔斐·维因概括说,欧洲哲学“大都是些书桌哲学、修道院哲学”,而美国哲学“显然是于平地之上”诞生的,并通过“多样化的生活拓展到了不同的领域”。^[2]而如今,欧洲的这种对存在深处的探寻同美国的随意自然、欧洲对于揭示知识论之荒谬性的偏好同美国纯粹以实践为目标的态度,混合在了一起,于是,似乎可以有史以来第一次谈到一种跨越大西洋的思想了。

二

然而,真正的美国思想却肇始于同欧洲遗产的分野。19世纪后半叶,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创立了维持近30年的“形而上学俱乐部”,在这里年轻的美国人订下了以科学精神重塑哲学的目标。这个俱乐部一跃而成为一种崭新而特别的美国哲学

的温床，皮尔士把这种哲学宣布为“逻辑的福音”。根据这种哲学，思想的意义要拿它所导致的行为方式来衡量，而行为方式本身又要以它是如何引导我们行动的来衡量。在皮尔士看来，每一种科学认识和理论都有其实践的尺度，实践对它加以拷问，以便使其价值完全由所取得的成果来判定。

由于皮尔士多方面的学识，实用主义这种“十足美国味的”哲学诞生了。不过，它不只是一种思想流派，还更是一种同世界的关系，或者，干脆就是美国的生活风格。实用主义指的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想”，而不是任何关于第一事物和最终事物，关于世界的最内在原理的问题。尽管皮尔士起初是将它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方法来发展的，可实用主义后来还是归结为了一种直接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工具。这种朝着生活实践的转向首先是随着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哲学家约翰·杜威对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的。于哈佛就读期间接触到皮尔士及其观念的威廉·詹姆斯，后来将皮尔士的理论加以通俗化，并赋予它以在欧洲知识分子看来甚为可鄙的美国功利主义特征。因为他片面地以为真理就是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顺便说一下，这种说法后来又被理查德·罗蒂所采纳）。詹姆斯有时还进行严格经济主义的论辩：一切都有赖于，从一件事情本身获取“最大程度的效果”。他还引人注目地谈到了其“兑现价值”。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约翰·杜威则将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如何实用主义地实现公共福利上了。他将思想的任务确定为：为公共生活的当下要求提供生动的阐释；这种阐释主要就是说

明当下正实际发生的社会及道德冲突。如此一来,哲学基本上就成了一种解决日常问题的活动。然而,这样一种做法在思想中所假定下来的便不是原则而是灵活性,不是固守原理和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公开讨论中不断交换意见。

三

在杜威看来,单单是多元主义、观点多样性及共同讨论,便可促进知识进步,而这些也正是他进行哲学思考的基础。不过,这同时也是民主的基础,那也就是说,民主乃是美国思想的“不可动摇的根基”。这或许便是美国哲学很大程度上失掉了苦行主义特征^[3](譬如,理查德·罗蒂就认为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明显具有这种特征)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第三任总统、1776年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这样宣称:“要是我的邻居认为,有二十个上帝或者一个上帝也没有,这对我一点也不会造成伤害。我既不会因此被抖空了钱袋,也不会因此被折断了腿。”^[4]因此,美国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有权相信所有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宗教的还是无神论的,他们有权按自己的判断去规划他们的生活;他们只是无权做出偏激行为——或者,无权以自己的行为损害他人的自由。在美国,民主原则是哲学的巨大支柱。在欧洲,民主价值首先得经过位列其前的理性的检测,而在美国,正如哲学家霍拉斯·卡伦于本世纪中叶在其“七条论纲”中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民主价值是不需要

任何合理性辩护的：

1. 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需要依据的；
2. 自创世以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3. 他们从造物主那里带来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权利；
4. 这些权利包括生活、自由及对幸福的追求；
5. 政府的意义在于保护这些权利；
6. 政府的职权须征得民众的同意；
7. 一旦一届政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民众便有权变更它或解散它……^[5]

四

除了实用主义和对民主的信仰之外，美国思想还有第三根支柱，这便是分析哲学，尽管分析哲学最初是欧洲的舶来品。它首先在欧洲施展开了其影响，或者更确切些说，激起了关于其有效性的讨论。起初，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试图从自然科学精神出发对哲学加以更新，以便它从所有形而上学负担中解脱出来。“哲学的正确方法实际上是这样的：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亦即与哲学无关的东西——之外，不说任何东西，而每当某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总是向他指明，他并没有赋予他的命题中的某些指号以意谓。”^[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莫里茨·石里克、奥托·纽拉特和鲁道夫·卡尔那普这样一些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正是他们开始着手创建一套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严格的反形而上学哲学,这种哲学只应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之上,而所有超乎此外的、臆想的深层问题统统都要当作无意义的胡说加以拒斥。这样一种科学理想的真理标准最终归结为每个词、每个语句的经验可证实性。具体地说:词和语句只有在其经验对应物经观察和实验证实了以后才能被有意义地使用。

然而,在每一种关于科学的“启发学”被提出来以后,在每一次强调为真理确立稳固的基础之余,总可由以下这种批评获得清醒的认识:它指出,再怎么言之凿凿的假设也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竞争理论中的一个而已。换言之:每一种知识都处在有限性的视界内,它是受到限制的。西方哲学就是从上述见解开始的,因为苏格拉底早已把关于自己无知的知识当作惟一真正的知识了。不过,正是这种关于“我一无所知”的认识促使哲学家进行思索,因为是这种认识教会他谦虚。“我知道我一无所知”,这也是卡尔·赖蒙德·波普尔爵士的座右铭,他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谦卑态度,成为了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的一位批判者。参加过维也纳小组讨论的波普尔指出,凭借经验证实绝不可以推论出普遍有效的真理来,毋宁说,如此得来的每一种真理永远都只是暂时的,原则上都可以由未来的经验加以修正。正如世纪之初物理学领域的巨大震荡和革命所表明的,借助于自然科学方法是得不到颠扑不破的知识的。为保持其效力,理论不应当试图去为其真理内容提供论证,而应当从原则上对可能的修正保持开放的态度,甚至去大力推进这种修正。

波普尔不同意维也纳小组的证实原则，而是提出了证伪原则，它要求的是探讨理论的可反驳性。为求得尽可能好的科学成果，波普尔赞同理论多元主义及理论竞争。但是，在涉及到每一种科学认识的方法论时，多元主义显示出了其局限性。这不过是说，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图景，无论它是多么地富于批判性，也都得援用理性的方法，因此，波普尔的哲学也被称作“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的学生保罗·费耶阿本德对科学领域内到底有没有理性提出了质疑。科学中不存在普遍主义，也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理性方法。所有的方法论，无论看起来多么具有说服力，都是有局限的，而科学成就恰恰经常是打破规则的结果。就此而言，既没有必要对无政府状态和不拘规则的研究加以阻止，也没有必要以任何臆定的普遍规律的名义去对它们加以引导。费耶阿本德的见地在以下这个著名的、带有挑衅性的结论中最为尖锐地表现了出来：“只存在这么一条原则……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可以得到辩护的。这条原则便是：怎么都行。”^[7]在整个欧罗巴－盎格鲁－撒克逊语区内，费耶阿本德的论点最彻底地否定了分析哲学试图为普遍有效的、非形而上学的真理提供科学理论基础的计划。

五

30年代中期，面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许多维也纳学

派科学家或者由于带有犹太血统或者由于支持社会主义而不得不逃难到美国。在那里,分析哲学首次施展开了其真正的影响,并一直主宰着同纳尔逊·古德曼、威拉德·范·奥尔曼·奎因、雅可·欣梯卡等思想家的讨论,直至六七十年代。几乎所有当代有名的美国哲学家都受其影响;可是几乎所有这些哲学家又都不同程度地从其中挣脱了出来。它的成功也可以这么来解释:它迎合了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同样反形而上学,只依赖于经验与科学。此外,担当了这种从欧洲舶来的理论的中介人角色的奎因本身就在欧洲度过了一个学年,并在此期间访问过莫里茨·石里克、鲁道夫·卡罗那普及其他一些人。然而,到了奎因这里维也纳学派的基本假定就变了样儿了,因为他不相信可以确立一套精确的科学语言,然后借助这套语言维持一种同世界的明确关系。因为确保科学陈述的可证实性,包含在维也纳学派的反形而上学计划之中。为此,需要一种语言分析,以便把日常语言的歧义性从科学语言中清除掉,并依据逻辑的理想来构造科学语言。然而奎因却指出,作为我们各自文化之表现的解释在科学一开始的时候便渗透进来了——而且这意味着它们业已渗透进了逻辑和数学命题中。就是在现代物理学中关于物理量的定义同荷马的神天之间也只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而不存在真理的大小差异。然而,纵使奎因持有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立场,他还是执着于科学的计划,并成为分析哲学最有说服力的代表之一,只是他对分析哲学做了实用主义的改造。因为奎因十分美国化地看出,对科学的实际状况而言,是没有理由对它

表示怀疑的,那就是说,对我们而言,科学乃是关于世界经验的最有用处的神话学。斯蒂芬·霍金的宇宙学向人们表明了,神话学同现代科学实际上挨得有多近:他借助于物理学及数学结构建立起了这样一些假想的世界:它们远离经验可感性,到达了艺术的边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奎因的两个学生希拉里·普特南和唐纳德·戴维森,他们将其老师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并部分地做出了更为彻底的解决,尽管希拉里·普特南最初是想避开奎因的相对主义结论并使真理在分析的意义上重新成为可理解的。可是他最终还是把这种企图当作徒劳无益的努力放弃了,并开始致力于构造一种“内在实在论”,这种理论主张:可以提到许多关于世界的理论,它们同样都是有道理的,因此也同样都是实在的。我们视为真的东西依赖于概念系统——或者更进一步说——依赖于我们所选取的语言,因而是“概念相对的”。可是,普特南担心这样会一步步滑向理查德·罗蒂和法国的雅克·德里达所持有的那种原则上怀疑论的立场。宁可说,普特南是企图在被他所摒弃的“形而上学实在论”与他要与之斗争的怀疑主义之间走钢丝。他陷入了这样的矛盾境地:先是修订了自己的论点,最后又去修订这种修订。普特南的思考目前退回到了实用主义的根本立场上来了,根据这一立场,只有在行动中,在民主地推动的研究的意义上,而不只是在认识论的反省中,才可望接近世界的真理。

唐纳德·戴维森在分析哲学中的辛勤耕耘,得到了另外一种至

少同样彻底的结论。他认为不言自明的是：每一种认识所表达出来的总是一种“完全的(radikal)解释”，所以最后决定我们所知道、所理解的所有东西的框架便是语言。最近，戴维森不再仅仅以为语言——像分析哲学那样——处于其描述现实功能的关联中，而是认为它也处于维持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交往关联中。

语言的交往方面也是约翰·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他以这一理论决定性地推进了同样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其对支配每一种言语行为的执行规则的研究反过来影响了欧陆哲学，而对于约尔根·哈贝马斯和卡尔-奥托·阿佩尔来说，这一理论成了他们接受作为任何一种言谈之基础的语用学共相的出发点。然而，自80年代以来塞尔的思想发生了一次从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向，通过这次转向他同样也打破了分析哲学的一个范例。他反对如下这个希拉里·普特南早先也特有的观点：可以将心灵过程比作电脑程序，也可以模拟出足够的存贮能力来。这么一来，心灵过程就成了纯粹形式的、原则上可用数学术语加以描述的过程了。然而，尤其是在其“中国房间”的论证中塞尔向人们指出，本质上总是包含着理解效能(*Verstehensleistung*)的心灵过程，绝不可以仅仅通过纯句法描述予以把握。作为机器的心灵无非就像可称作“空洞的行为”的那种情况：它其实并不知道它在做什么。同认知科学相反，塞尔不只是想探究心灵的形式结构，而是执意要研究关于它的语义学。换